

理解“资本主义”： 马克思、松巴特、韦伯相关理论之比较

姜 宏

摘 要：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社会科学领域最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作为一个思想概念的“资本主义”，主要源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马克思的分析图式受到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而这一点长期为学者所忽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观点，在《资本论》创作前后经历了一次转向，产生了两个用法。马克思之后，德国青年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松巴特和韦伯，依托历史学派的传统立场，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反方向分析资本主义的兴起，构建起了更复杂的“资本主义”学说。源于德国思想界的这些“资本主义”理论，比现代经济学更早地，某种程度也更深刻地触及了欧洲兴起这个主题。研究“资本主义”概念的构建、演化过程，不仅从理论上对于加深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理解现代化与建设自主的知识体系，也有着实践上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资本主义 卡尔·马克思 维尔纳·松巴特 马克斯·韦伯 德国历史学派

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社会科学领域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众所周知，作为一个思想范畴的“资本主义”，来源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作品。^①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封建社会之后的社会发展阶段，是人类历史发展诸阶段中的一个——这种源自德国历史学派的分析思路在马克思身上有着更卓越的体现，其分析力度甚至超过了历史学派成员自己。但马克思替换掉了德国历史主义传统中的唯心因素，将社会发展的动源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早期）和阶级斗争（后期）。维尔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②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作者简介] 姜宏，海德堡大学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研究所，电子信箱：hong.jiang@uni-heidelberg.de。

① 在本文的行文中，当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出现的时候，笔者不使用双引号；当“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概念范畴出现的时候，笔者使用双引号，以示区分。

② 亦有译为维尔纳·桑巴特。

二人是青年历史学派成员——则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图式有着片面、单一的不足，尤其表现在对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分析上。本文致力于全面考察马克思、松巴特、韦伯对于“资本主义”概念的构建历史和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因果解释理论。

对于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形态，他也是在这个层面上去解释“资本主义”、构建相关理论的。早期的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和德国历史学派中吸收了有关历史进步的理论，将资产阶级社会定义为继封建社会之后而起的一种经济社会阶段，并对资本主义带来的生产力进步持相当积极的肯定态度。在移居英国后，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用法专门化，在《资本论》中批判基于剥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期的马克思，主要吸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其分析表现出了更高的理论抽象程度，将德国历史学派浓重的实证色彩抽离出去。年轻一代的德国历史学派成员，包括松巴特和韦伯，则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反方向对资本主义的兴起进行解释。

本文采取一种情景式、整体性的分析框架，将马克思、松巴特、韦伯构建理论的过程放入时代智识背景中去理解。这种分析框架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本文不仅将马克思，也将松巴特和韦伯，置入时代的思想潮流之中，在这个层面上可以清晰地看出德国历史学派对马克思的智识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德国历史学派对松巴特、韦伯的智识影响；其二，本文主张，对于马克思、松巴特、韦伯三位学者的思想，要考察他们整体的思维进路。要实现第二点，就要全面把握三位思想家的相关作品，这不仅有利于厘清学说体系的构建过程，而且也是把握思想要义的必要条件。

本文将梳理德国三位思想家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构建历史和因果解释理论。第一部分聚焦于德国历史学派的学科特点，包括演化纲领和跨学科方法论。第二部分解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学说，并将其放入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脉络中考察。第三部分考察稍晚于马克思的松巴特和韦伯如何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反叛”来构建自己的“资本主义”概念，^①并提出各自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解释。第四部分尝试提出一个对话框架：德国“资本

① 笔者想在这里提请注意，松巴特和韦伯的“资本主义”概念并不相同，甚至有相当大的差异。在这里将二人并列主要出于如下原因：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松巴特和韦伯（二人皆为青年历史学派）都从另一个方向——精神利益——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兴起，尽管韦伯的晚期作品，特别是《经济通史》，有着更复杂（未完成）的考量。

主义”理论如何介入经济史领域中西“大分流”议题和发展经济学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的过程也是西欧实现领先的过程，其因果解释应重新重视马克思、松巴特、韦伯等人的开创性思想。第五部分是总结与启示。

一、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框架

德国历史学派在19世纪欧美社会科学界有极大的影响力（胡明，2008；Peukert，2001a）。从渊源上看，德国历史学派与18、19世纪德国流行的三种思潮有很深的关系。第一是重商主义思想的德国版本——官房学派（胡明，2019：168—171；梅俊杰，2022a）。在传统的古典经济学视角下，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和产业扶持政策的重商主义代表了一种幼稚片面的发展思想。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对重商主义的思想价值进行了重新评估，认为重商主义包含着后发国家的赶超策略（唐万宁，2022；梅俊杰，2017）。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和政策立场也恰恰是德国这种后发工业国家民族情绪的一种反映。第二是欧陆的唯心主义（idealism）运动。这是启蒙运动在德国的一种表现形式，尤以黑格尔（G. W. F. Hegel）为典型代表。黑格尔哲学的两个取向——“精神性”因素的重要性、历史的整体性理论——深刻影响了德国学术界（Schefold，1996：174—178；Roth，1987：76）。第三是德国的历史主义思潮，包括历史法学派（李哲罕，2014）。历史主义对“观念”、国家、整体性理论的强调都对经济学领域的历史学派影响深远（Brand，1982）。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三种思潮彼此也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共同影响着德国思想界。

经济学的德国历史学派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时期就已经出现鲜明的理论特征，在威廉·罗舍尔（Wihlem Roscher）^①和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Bruno Hilderbrand）时期正式形成老历史学派。他们的主要理论特征包括：（1）不同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重视演绎的做法，历史学派重视归纳法，强调通过掌握历史材料来描述社会经济现象。他们对于得出普适性经济理论持怀疑和望而却步的态度。（2）在分析社会经济现象时，历史学派主张一种多维度的视角，将文化习俗、政治制度、宗教精神等因素都纳入考察范围。马克思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曾将历史学派的这种方法批评为

^① 亦有译为威廉·罗雪尔。

多元生产力理论。(3) 历史学派独具特色的特征是对经济史的演化视角 (Pirenne, 1914; 贾根良、黄阳华, 2007; 严鹏, 2011)。历史学派经济学家主张, 人类的经济社会具有阶段性的演化特征。李斯特将生产状态划分为野蛮、畜牧、农耕、农工、农工商五种类型, 卡尔·比歇尔 (Karl Bücher) 将经济发展分为封闭的家庭经济、市镇经济和国民经济时期 (桑巴特, 2023/1927: 150、155)。古斯塔夫·冯·施莫勒 (Gustav von Schmoller)^① 主张, 经济学要满足于沿着时间维度对个别经济形式进行描述 (黎岗, 2022)。在马克思、松巴特、韦伯的思想中可以明显看出历史学派的痕迹。

德国历史学派构建经济阶段理论有着深刻的政治用心。在 19 世纪前半叶, 德意志处于政治分裂的状态, 工业化也落后于英法。李斯特认为, 德国和英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贸易自由主义不适用于德国这种后发国家——这种“区别对待”也就为亲政府的政策搭建起了合理性 (梅俊杰, 2022b: 129—135; Pradella, 2014)。的确, 历史学派的经济阶段论为国家干预留出了很大的空间, 也造就了他们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可以说, 自诞生起, 历史学派就和德意志国家的国运绑定在一起了 (Janssen, 2011: 31—49)。尤其是以施莫勒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 对普鲁士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亲和感已经深入他们的学术作品和政治活动中。^② 他们在大学课堂上的授课风格几乎可与政治鼓动相媲美, “他们讲课的特点是价值判断与事实的大杂烩” (斯威德伯格, 2021: 261)。历史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希尔德布兰德 (2023/1873: 10) 的宣言很具有代表性:

① 亦有译为古斯塔夫·冯·施穆勒。

② 施莫勒的个人经历很能说明问题。施莫勒性格强悍, 在学界和政界之间长袖善舞, 与普鲁士教育部的关系非常好, 还长期控制着在德语区势力强大的社会政策协会。在施莫勒等人的倡导下, 俾斯麦政府通过了一系列社会保险法 (其中俾斯麦也有缓和工人阶级反抗运动的意图), 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社会福利体系, 成为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滥觞。在他的主导下, 德国高等教育界铁板一块, 数十年间成功阻止了经济学理论家——施莫勒不喜欢的新古典派学者——在任何一所德国大学获得教职。更微妙的是, 施莫勒还曾阻止了弗莱堡大学对韦伯的教职任命, 因为他想让韦伯留在柏林的法学界。1894 年弗莱堡大学第二次向韦伯发出邀请, 才获得通过。在施莫勒看来, “经济学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简化成‘只是关于市场和交换的理论’, 而应当成为‘宏大的道德与政治科学’” (斯威德伯格, 2021: 260; Kersting, 2022)。

我们这些人对国家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既反对以自然法为依据无限地颂扬个体的专断，也反对一个以专制主义为依据、干涉一切的国家权力。只要我们把国家角色放在历史的巨流中考量，就会承认，国家的任务应视当时的文化状况而定，有时比较狭窄，有时比较宽泛。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像自然法学说和曼彻斯特学派那样，把国家视为必须尽可能被限制的“必要的恶”。国家永远是培育人类的最伟大的文明教化制度。我们不希望不同经济地位的阶级通过你死我活的斗争来夺取政治权力，因此支持立宪。我们支持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因为它能够凌驾于狭隘的阶级利益之上制定法律，通过法律手段令政府保护弱者，改善低下阶层的地位。我们投身于一场持续二百年的斗争当中，在其中，普鲁士全体公职人员和普鲁士王国为法律平等、消除上等阶级的特权、解放低下层人民和改善其生活不懈努力，并获得了丰硕成果。这正是德意志国家制度最优越的、我们永远不能背弃的承传。

德国历史学派的亲国家立场使他们的学说具有相当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形成了19世纪的“德意志特殊道路”（Deutscher Sonderweg）学说（Kalberg, 1992; Curi and Almeida, 2022）。这种路线的顶点便是纳粹政权的崛起。也正是这种命运，使“德意志特殊道路”在二战后成为一种政治上不正确的学说。但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传统，包括整体性理论、对政府行为的强调，在20世纪的弗莱堡学派、二战后德国政府施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得到延续（Tribe, 1995: 203—240; 贾根良、黄阳华, 2007: 104; 吕守军, 2010）；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成为二战后德国发展经济的基础理论。^①

今天从经济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在阅读历史学派作品的时候一定会感到相当陌生：在历史学派作者们的作品中，甚至可以读到对语言文字的起源之类话题的探讨（Schmoller, 1920）。历史学派的作者们丝毫不曾限制自己的思考范围。但是，历史学派的研究取向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立场。如果考虑

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充分尊重市场竞争的前提下，主张政府为市场运行创建政治性、社会性框架，实现有序竞争，通过高税收限制过分积累，实行高福利，实施适度产业政策。这使德国模式区别于英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父”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的思想，可参见他本人的著作（Erhard, 1957）。

到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和现实关怀，人们似乎从他们勾勒出的图景中看到了经济学本应该成为的样子。然而，无可否认，历史学派的衰亡有着深刻的自身问题，他们的方法论基础是薄弱的，或者说，历史学派的学者们自己没有构建出足够有说服力的科学理论体系。

成长于德国思想环境中，马克思、松巴特、韦伯的思想背景都有着浓重的历史学派色彩，松巴特和韦伯本身便是青年历史学派的成员。在理解现代社会这个主题上，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是三人共同的核心旨趣。

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学说

在主流经济思想史领域，研究者们绝大多数时候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释读为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和发展（Blaug, 1997; Schefold, 1989）。这种分类方法固然正确，但是相形之下，马克思同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传承关系，很大程度就被忽视了。马克思构建的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他的社会经济阶段理论，可以说是完美的德国历史学派的后裔（Birnbaum, 1953）。这种继承关系如此显著，以至于谢弗德（2023）称马克思为德国历史学派中的“左派”。在德国经济思想史领域，有部分学者也一直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学说接续到德国学术传统中（Sombart, 1894; Croce, 1914）。Parsons（1928）更是将英国古典经济学脉络和德国历史学派脉络并列为释读马克思主义的两大进路。

曾经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马克思将黑格尔的唯心立场抛弃，^① 代之以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拒绝承认历史发展是由意识所推动的这种唯心主义解释（斯通普夫、菲泽，2009：340）。同时，马克思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努力，受到德国历史法学派的影响。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等人对于产权形式的历史分析影响了早期马克思（Levine, 1987）。马克思保留了德国历史主义中“历史进步”之类的概念，这就决定了马克思要构建出一种“整体性”理论，并接受一种历史目的论立场——“黑格尔辩证法为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整合进历史维度提

① 柯林斯和马科夫斯基（2014：54）解释了马克思的老师布鲁诺·鲍尔（Bruno Bauer）对马克思的影响，鲍尔“宣称基督福音书是伪造的，而耶稣的存在是个历史之谜”。

供了方法”（吉登斯，2013：5、250）。对黑格尔和德国历史学派而言，这种“历史进步”背后是伦理的力量；对马克思而言，他早期认为生产进步是推动历史的最终力量，后期则认为阶级和社会关系的紧张对抗才是动力源。然后，正如上文所呈现的那样，历史学派的另一块基石便是关于经济阶段（Wirtschaftsstufe）的理论。经济阶段论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浓厚底色（Hoselitz，1960：193—238）。广为人知的是，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构建了自己的社会类型学（吉登斯，2013：29—32）。^①这一点可以在引用率相当高的马克思（1998：413）的一句名言中看出来：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②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In großen Umrissen können asiatische, antike, feudale und modern bürgerliche Produktionsweisen als progressive Epochen der ö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 bezeichnet werden.)^③

但是，这句话的含混之处颇多。一个首要问题是，马克思是否认为这几个阶段之间是前后相继，或者说，一种线性发展的关系。^④第二个问题是，这种历史进程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对这两个问题而言，亚细亚生产方式都构成了一个棘手的难题。马克思在早期作品中主要依靠欧洲历史资料，描绘了一条西欧发展的单一线索（吉登斯，2013：34）。此时，马克思对于亚细亚问题

① 马克思的这种经济阶段论立场实际上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发展经济学。大部分学者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沃尔特·罗斯托（Walt W. Rostow）等人的经济理论的联系，却忽视了其中历史学派的角色（de Paula，2015）。

② 关于此处翻译为“资产阶级的”，笔者持保留意见。根据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写作时的理念和逻辑推断，此处为德语原意“市民的”更为妥当，这代表了马克思对历史分期的一种判断。笔者同意沈越（2013）对bürgerlich（市民的）一词的讨论。但为遵循习惯用法，本文依然使用“资产阶级的”。

③ 德文见于马克思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

④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2012：168）断言：“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

的认识更多来自前人学者（如黑格尔）的讨论，认为东方社会的灌溉需求导致一个强大中央政府的出现，形成了东方社会的专制倾向。之后，马克思的看法经历了一些变化，认为村社的自给自足性质带有一种高度抵制变化的品质（Kumar, 1992）。马克思在论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时候，并没有认可东方社会有进步的可能（Jiang, 2023: 7—9; Kołakowski, 2005: 287）。

马克思有关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除了分散在众多作品中的框架性语句之外，并没有完整表述。研究马克思的学者不得满怀遗憾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并未对其历史唯物论的思想加以系统地阐述，即便应用到其全力关注的资产阶级社会形态时，也依然如此。”（吉登斯，2013: 265）虽然普遍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思想范畴来源于马克思（Hilton, 1952），但是，马克思（1975: 137）在他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作品《资本论》中只有一处具体使用了“资本主义”（Kapitalismus）这个术语（谢弗德，2023）：

只要假定动机不是发财致富本身，而是享受，资本主义就从根本上被废除了。

(Der Kapitalismus ist schon in der Grundlage aufgehoben durch die Voraussetzung, daß der Genuß als treibendes Motiv wirkt, nicht die Bereicherung selbst.)^①

就马克思脑海中的“资本主义”而言，他有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用法，也有一个非常专门化的用法，两者的区别与马克思进行思考和创作的成熟程度有关。要正确看待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就必须使用一种整体性框架。这也正是马克思自己的构想。正如吉登斯（2013: 13）所言，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整个著作体系中具有突出重要性”：

从本质上来说，它们^②是马克思在出版《资本论》一书以前的最早数篇草稿。在《手稿》所撰写的序言当中，马克思勾画了一个颇具雄心的研究计划，但他最终未能完成这一计划。这一马克思知识生涯相对早

①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四章“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的结尾部分。

② 指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期的计划无可置疑地表明，尽管《资本论》最终是以如此冗长和详尽的面目问世，它仅仅是马克思旨在从一个更宽广的视野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要素之一。

在19世纪50年代，出于理论和现实的原因，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某种明显转向。1848年革命的失败对马克思来说有着重要意义。对于他的个人生活而言，革命失败招致的进一步政治迫害使马克思不得不流亡伦敦，并且终生未能再回到欧陆生活。对于他的知识生涯而言，这开启了马克思思考方式的一个重要转向：马克思意识到揭示作为一个经济系统的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的重要性（Giddens, 1970）。马克思在移居伦敦之前，乃至刚搬到伦敦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使用的仍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样的术语——这一点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依然清晰可见。1857—1858年马克思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①（*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时已经在寻求使用一个新的概念来替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Shigeta, 2004）。马克思在移居伦敦之前，更多受到他的德国智识背景的影响——那时在德国还不存在成熟的工业化社会；在彻底融入英国生活后，马克思找到了他的重点主题——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知识生涯的相对早期，他构建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概念代表了一种尺度更大的划分：从封建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的转变。但是这一概念对于晚期的马克思来说，局限性是明显的。马克思的目的在于分析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历史形态，这种形态既是历史的也是抽象的。因此，马克思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也代表了马克思思考逐渐成熟和完整的过程。

^① 在马克思的众多作品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尤其具有神秘性。马克思移居伦敦后，在大英博物馆开始了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密集学习。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留下了丰富的笔记，这就是《大纲》。但其中包含的并不仅仅是马克思的学习笔记，还有他的创作构想。《大纲》包含六个主题：个别生产、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其中只有第一个主题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得以完成——《资本论》第二、三卷是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编辑的。我们根本不可能确切知道马克思的最终完整想法。《大纲》普遍被认为是《资本论》的底本。但是，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在1902年才首次在马克思的大量遗作中发现《大纲》，而且，非常有可能的是，负责编辑马克思遗著的恩格斯也并没有见过这份《大纲》（Musto, 2008: 179）。

这种转变在另一个层面上也是清晰可见的：马克思在早期作品中，特别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历史发展动力的时候更多在强调生产力进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及之后的作品中，则更强调阶级及阶级斗争（Katz, 1993）。

马克思在论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时还带有很明显的德国智识背景的痕迹，他脑中想到的是一个在封建社会逐步瓦解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形态；在论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马克思想到的已经是机器大工业的资本主义。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十分清晰，马克思也没有尝试把前者——早期思想活动的产物——与后者进行整合（伍德，2016：26）。但是，如下判断应该是符合马克思的逻辑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一种范围更大的概念，涵盖了两个部分——封建主义瓦解和工业革命之间的社会形态，以及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然而，第二部分并不必然是第一部分发展的结果。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将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作为他描绘和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准模板（Giddens, 1970）。韦伯也同意这一点（Grundmann and Stehr, 2001）。但是，不同于韦伯（见下文），马克思认为理性是资本主义兴起之后的产物，而不是相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出现的主要社会性力量是强制和外部压力（Birnbaum, 1953）。

在谈及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时候，马克思的这种进路显示出了它的逻辑结果。马克思认为，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存在两种方式。第一种是贸易商人转移到生产领域，并成为资本家，这种现象首先发生在意大利北部，之后发生在英国，但是，马克思强调，由这种方式转变而来的资本家很快成为“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障碍”（Hilton, 1952）。第二种是一种“真正革命的道路”（really revolutionary way）：个别生产者通过资本积累，逐渐从生产领域扩展到贸易等其他领域，（在英国）通过圈地运动和其他方式霸占生产资料，并将自耕农同生产工具剥离变成产业工人；在这一过程中，海外殖民活动大大加速了资本积累的过程，^① 随之而来的刺激加快了资本主义的

① 在这个过程中，难免要涉及马克思的资本原始积累概念。对应于“原始”一词的德文为“ursprünglich”，这个词含有“初始的、发生的”之意，也含有“兴起的”之意。在笔者看来，中文的“原始积累”译法不能完整传达出德文所包含的丰富意象。而且，根据笔者的解读，马克思在使用这个词时恰恰想的正是这层“兴起”之意。

发展；随着市场的扩张和需求的高涨，现存的生产能力不再能满足要求，就产生了向更有效率的技术方式转变的压力，由此产生了工业革命（Sweezy and Dobb, 1950；吉登斯，2013：44—45）。机器大工业从此主导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也成为马克思晚期使用的那个更专门化的“资本主义”。

三、“反叛”：松巴特、韦伯的“资本主义”学说

马克思于1883年在伦敦去世后，恩格斯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要诠释者。作为工人运动的思想指南，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层面日渐脱离了马克思本人的构想，但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正迅速推动着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19世纪及20世纪初欧洲范围内最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一种学说，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在德语区学者之中激起了广泛的回应：一方面，德国学者，如松巴特、鲁道夫·希尔弗丁（Rudolf Hilferding）、^①拉迪斯劳斯·冯·鲍特基维茨（Ladislaus von Bortkiewicz），在认同马克思主义主体结构的情况下，提出了“修正式”（revisionist）理论；另一方面，来自奥地利的学者，如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Böhm-Bawerk）、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则集中攻击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的矛盾（Collins, 1980）。^②成长起来的德国青年历史学派也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发起了此起彼伏的学术“反叛”。可以说，青年历史学派不仅延续了新历史学派的基本取向，而且在与马克思主义的碰撞中形成了新的理论，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德国社会科学界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发生了一次研究范式的转向（Kruse, 1990），而且尝试去构建一个新的学科——社会经济学。^③

① 亦有译为鲁道夫·希法亭。

② 即价值转形问题，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供了一个答案，但经济学家普遍对马克思的解法不认可。这个争论极其复杂，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关键点之一。

③ 这一尝试集中体现在韦伯从1908年起编辑《社会经济学大纲》。对于韦伯而言，如果要真正表达出经济学这一学科应该覆盖的研究内容，那么，这一学科的合适称呼应该是“社会经济学”，而且应该包含三个部分：经济理论、经济史和经济社会学。事实上，熊彼特与韦伯对于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的看法相当一致（斯威德伯格，2021：228—240、299；Swedberg, 1995）。

青年历史学派的典型立场是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认为马克思不恰当地忽略了“精神性”（spiritual）因素的重要性——这是德国历史学派长期以来看重的关键取向之一。Hintze（1931）的一段评价很好地总结了德国青年历史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批评：

不论在政治生活还是宗教生活中，一切人的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无论何时何地，社会行为的第一推动力通常都来自实际利益，即政治和经济利益。但是精神利益给这些实际利益插上翅膀，赋予后者一种精神意义，并为之辩护。……没有这种“精神羽翼”的利益只能跛行。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当观念与实际利益联系在一起时，观念才能获得成功。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意象没有充分表达出利益和观念的这种特殊关联。在这种意象里，“意识形态”很快就丧失了现实性。而且，马克思主义模式有一个缺陷：它是静态的，尽管它试图描述出社会的动态转化。在经济基础发生转变时，上层建筑并没有随之而转变成相应的形式；相反，上层建筑与整个社会一起分崩离析。我认为，更恰当的意象应该是利益与观念的中轴坐标意象。从历史的长远观点看，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缺一不可。^①

在马克思去世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德国的社会科学家们，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行抨击，并提出自己的解释。在法学界，法学家鲁道夫·施塔姆勒（Rudolph Stammler）不认可马克思将法律简化为只是经济关系的反映，认为恰恰是国家立法塑造了经济（Stammler, 1914: 5—12）。在经济学界，松巴特和韦伯的早期作品都围绕着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而展开（Roth, 1968）。阿尔伯特·萨洛蒙（Albert Salomon）甚至将韦伯成为社会学家的过程归结为“与马克思的幽灵进行长久而激烈的对话”（Salomon, 1945: 596）。^② 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韦伯的大部分作品是“对马克思的理论

① 中文译文见本迪克斯（2020: 34—35）。

② 原文为“Max Weber, the historian of law, the political scientist and economist, became a sociologist in a long and intense dialogue with the ghost of Karl Marx”。实际上，萨洛蒙走得更远，他将韦伯写作《经济与社会》的主要动机解读为“重新检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说”（reexamine the Marxian sociological thesis）。然而，笔者不能完全同意这种简化说法。

的一种检验和修正”（Birnbaum, 1953）。韦伯甚至被称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Kocka, 1973: 54），这种评价既言明了韦伯的政治立场，也从侧面反映了二人难分轩轻的学术地位。韦伯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重要作品——《德国易北河以东地区农业工人状况》——渗透着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影响。^① 本部分聚焦松巴特和韦伯的“资本主义”学说，从中可以看出二人同马克思的学术继承及“反叛”关系。

（一）松巴特的“资本主义”学说

松巴特和韦伯同为德国青年历史学派的成员。^② 松巴特（1863—1941）年长韦伯（1864—1920）一岁，并且在20世纪早期比韦伯享有更高的学术声誉（Backhaus, 1996: 13—18; Lenger, 2012: 129—135）。作为一名学者，松巴特具有突出的个性特征。他的文字妙笔生花，极具画面感和感染力，乃至被称为“艺术家”（Epstein, 1913: xv—xvi）。松巴特受到历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影响，他曾是施莫勒的学生，早年以一名马克思主义诠释家的姿态登上学术舞台。他对《资本论》第三卷的解读曾得到恩格斯的热情赞扬：第一次有一位德国大学教授，在马克思的作品中看出了马克思真正要说的东西（Grundmann and Stehr, 2001）。松巴特是二战前的最后一任社会政策协会主席——他亲手解散了这个德国最大的经济学家协会，以避免该组织被纳粹政权利用。但松巴特的命运在去世后还是和纳粹主义纠缠在了一起。

松巴特可以说是20世纪初极为重要的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之一，但在现代学术界几乎湮没无闻。松巴特的声名下坠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他在20世纪30年代后对纳粹主义的靠近使得他成为一个饱受非议的人物，在一定

① 受德国社会政策协会委派，韦伯在1890年初开始调查德国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问题，调查结论便是1892年的这部《德国易北河以东地区农业工人状况》。其中关于大庄园制瓦解、资本主义式生产关系出现的描述，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在韦伯这里的影响（参见蒙森，2023: 26—32）。

② 松巴特的历史学派身份毫无疑问，他是施莫勒的学生，并且长期担任社会政策协会——历史学派的大本营——的主席一职。韦伯的历史学派身份较受争议，一方面韦伯的认识论基础是新康德主义（Schluchter, 1989: 3—10），在“方法论之争”中倾向奥地利学派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的立场，并在“价值判断之争”中对施莫勒阵营展开了猛烈抨击；另一方面，韦伯在他的弗莱堡大学入职演讲中旗帜鲜明地将自己定位为历史学派的成员（Weber, 1993/1895: 543—574）。

程度上造成了他在学术界的声名消散。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韦伯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虽然韦伯热情支持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但韦伯对克里斯玛型政治领袖的呼唤也是十分真挚的。在一战后，韦伯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加入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委员会。这部宪法充分体现了德意志法学界的最高水准，但韦伯强力支持在宪法中加入“紧急戒严令”——赋予共和国总统以独断专行的权力，这一条款后来成为希特勒合法登上权力宝座的宪法基础。可以说，难以预料韦伯（1920年逝世于慕尼黑）如果活到20世纪30年代面对政治局势会如何选择。^① 韦伯的早逝使他躲过了德意志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使他在科学万神殿中的位子得以保留（Grundmann and Stehr, 2001）。但这种观点并不足以完全解释问题。海德格尔也曾和纳粹政权有着无法自辩的关系，他甚至加入了纳粹党，并出任纳粹政权下的弗莱堡大学校长。海德格尔活到了1976年，在二战后有充足时间使自己的学术生涯继续下去。松巴特去世于1941年。或许，就学术声誉而言，松巴特的“不幸”在于他的物理生命够长，长过了韦伯，亲历了纳粹的兴起到巅峰过程，却又不夠长，没有像海德格尔那样在战后“获得宽恕”。

于“资本主义”而言，松巴特的政治立场绝非历史轶事这般简单，二者交叠在一起。松巴特的重要作品，如《现代资本主义》和《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都包含着他对特定人群和资本主义兴起之间关系的理解——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也是此种进路，虽然韦伯采取的是更为灵活的方式（Grundmann and Stehr, 2001）。在德国政治运动的光谱中，反犹太主义中的关键一环是将犹太人的社会经济活动和日益败坏的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日益失控的工业-金融资本主义是造就后者的元凶。而把犹太人和资本主义兴起联系在一起正是松巴特的“关键贡献”。的确，松巴特也曾哀叹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诸种问题。对于那个时代的德国思想界，这种看法并不罕见。社会道德的堕落和现代社会的日渐成熟，二者相伴而行，这是德国浪漫主义的一项悠久传统，

① 韦伯从来不曾掩饰他对于一个强大的德意志民族帝国的渴望。在1918年以前，韦伯支持德意志帝国的“世界政策”，积极支持为德国争取生存空间的帝国扩张政策；在1918年后，韦伯支持一个凯撒式共和国领袖，呼吁一个由民众直选的克里斯玛型领导人的出现。关于韦伯政治活动的更多历史细节和分析，参见蒙森（2023）。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韦伯的“铁笼”理论都属于这一传统的产物。^①

在松巴特的“资本主义”学说中，“非经济性”因素得到强调。得益于历史学派的传统，松巴特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在解释资本主义兴起时缺少说服力。因此，他展开了一幅宏阔的历史画面。相比其他学者，松巴特的思维进路多样、繁杂，迄今无人可出其右。^②正如晏小宝（2023：11）在《战争与资本主义》中译本的序言中所言：

仅就对资本主义形成与发展的考察而言，桑巴特的视野显得更为开阔，分析更为细致，其所涉及的视角从宗教伦理、精神因素、爱情、奢侈消费乃至战争等诸多方面对资本主义的影响，为我们展示的是一幅全方位、活生生、色彩斑斓、错综复杂的资本主义发展史。

在封建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马克思只提供了很少的具体历史资料。^③松巴特则在这个方面展现了他的个人才华，其作品中包含了大量的历史细节，情节之丰富丝毫不逊色于史学作品。^④1902年首次出版的《现代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形态首先出现于地中海城邦，那里的商人得益于复式簿记开展了大规模商业贸易，还涉及了犹太人的独特作用；1911年出版的《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是对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回应，认为犹太人的逐利心态和分布广泛的金融投机活动为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1913年出版的《奢侈与资本主义》和《战争与资本主义》则分别将资本

① 韦伯对官僚系统“铁笼”的描述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后果的描述几乎一致（吉登斯，2013：276）。具像化为高楼大厦和工厂流水线的现代社会越是饱满，人们对简朴单纯的“旧时光”就越是渴望——只是学者们可不会沉溺于这种简单的“感时伤怀”，他们要把这种情感转变为对“进步力量”的辩证思考。多说一点，异化的概念，从马克思1844年之后的作品中消失了——这标志着马克思摆脱早期德国智识背景的又一个侧面。

② 当代德国经济史学家维尔纳·普林佩（Werner Plumpe，亦有译为维尔纳·普伦佩）采取了极为相似的进路，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兴起过程（Plumpe，2019）。虽然普林佩早年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还参与创建了地方性质的共产党组织，但他在解释资本主义时采取的是松巴特式逻辑。

③ Hollander（2011：328—336）认为，恩格斯的历史素养要高于马克思，这一点可以从恩格斯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三部著作是构建历史唯物主义非常重要的作品——中看出来。

④ 松巴特被誉为“有史以来经济学家中历史知识最渊博的人之一”（谢弗德，2023）。

主义的兴起归因于中世纪晚期欧洲宫廷的奢侈生活和欧洲各邦国强化军队的举动，认为二者刺激了需求、扩展了市场、促进了新式经济组织的出现。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列出了诸多因素，松巴特也并未给哪一种因素赋予突出重要性。

对于松巴特而言，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经济系统：组织层面，它基于的是两个集团（生产资料拥有者、无产工人）以私有方式进行市场交换；精神层面，它基于的是资本家的竞争关系、攫取精神和理性能力；技术层面，它基于的是脱离有机物的能源方式（Parsons, 1928）。同时，在构造经济阶段理论方面，松巴特接受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关于“需求满足”（Bedarfsdeckung）活动和“营利”（Erwerb）活动的区分——亚里士多德的这种二分法也影响了马克思对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划分（Schefold, 2016: 5—19; Schefold, 2019: 163; 斯威德伯格, 2021: 340）。于是，松巴特对于“资本主义”的概念构建工作就非常清晰了：他把资本主义分为前资本主义、早期资本主义和成熟资本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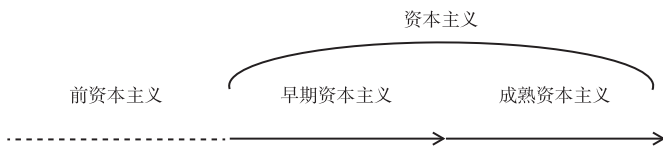


图1 松巴特的“资本主义”类型学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对于松巴特来说，“资本主义”标志着经济活动从满足需求的动机转变为逐利动机，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复式簿记、犹太人活动、奢侈、战争等多种因素都发挥了作用，而且，这一转变过程开始于中世纪的中晚期，首先可见于意大利城邦。从这种范式中可以看出，松巴特对于经济历史的分期方式传承自德国历史学派（童欣，2011），同时也受到马克思的影响——施莫勒和马克思在松巴特的头脑里同时可见。松巴特对于“资本主义”的定义，几乎与早期马克思相同；他的“早期资本主义”近似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商业资本主义”，他的“成熟资本主义”则近似于“工业资本主义”。但是，晚期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定义，则要窄于松巴特，而与韦伯更相近。

（二）韦伯的“资本主义”学说

韦伯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身份，今天被学界忽视了（Schefold, 1992: 5—

31; Kurz, 2021)。今天韦伯主要是作为一位社会学的奠基人而被纪念和引用。但是,无论是韦伯的同时代人物,还是韦伯自己,都将其作品视为经济学的一部分——如前所述,这源于在特定历史时期,德国的经济学具有的特殊性质。与那个时代的多数学者类似,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兴起及其后果,占据了韦伯学术工作的中心位置。韦伯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兴起最著名的作品,毫无疑问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追溯韦伯的学术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出韦伯这部重要作品的性质:其一,受到松巴特的重要影响(Lehmann, 1993: 195—208; Appel, 1992: 232);^①其二,受到那个时代学术气氛,特别是历史学派研究主题的深刻影响(Nipperdey, 1993: 73—82; Hennis, 1988: 41—83)。松巴特率先开始了从“精神”角度批评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学术工作。虽然韦伯也遵循了历史学派传统的这种路径,但他认为松巴特把资本主义兴起归因于犹太人的做法是一种轻率的错误。

虽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强调加尔文宗教义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重要作用,但是韦伯的这部作品却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单纯的、把马克思主义逻辑颠倒过来的文化或精神决定论。^②必须指出的是,对韦伯作品性质的认识,不能采取任何一种简化版本:“韦伯有关资本主义和宗教的著作的主体不是简单地或直接地对马克思著作做出的学术反应”(吉登斯, 2013: 246),韦伯有关新教的著作也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对松巴特《现代资本主义》做出的学术反应。韦伯甚至不能被单纯地理解为一位马克思的批评者(Giddens, 1970; Mommsen, 1977; Kurz, 2021; Topolski, 1990)。考察一下韦伯的“资本主义”学说,这一点便明白无疑。

就“资本主义”学说而言,韦伯从他的经济史工作中受益良多,其中特

① 在探讨精神性因素对资本主义的作用时,韦伯受到松巴特作品的刺激——这一点主要是通过作品的出版顺序来证明的。松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出版于1902年,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一部分出版于1904年。但韦伯研究专家,如斯威德伯格(2021)、Giddens(1970),认为韦伯的最初想法在19世纪90年代就已经形成。

② 对韦伯这部作品的过分简化解释今天依然可见于社会科学领域。用变量遗漏来批评韦伯实是由于对韦伯思想整体性的把握不足(刘林平、任美娜、杨阿诺, 2021)。即使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完整作品,也应把它置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作品以及未完成的《经济与社会》的广阔框架中来把握。马涛(2020: 249)正确地评论道:“韦伯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他首先阐发了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一种‘文化力’的配合与启动的思想。”这种关系绝非因果,而是一种“亲和性”。

别重要的是他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经济史的考察 (Riesebrodt, 1986; 熊春文, 2022; 严鹏; 2015)。在 19 世纪末, 德国学术界出现了一场以比歇尔为首的“原始派”与以爱德华·迈尔 (Eduard Meyer) 为首的“现代派”的论争, 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可以使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概念去分析古代经济 (Schefold, 2011a)。“原始派”拒绝这种可能, “现代派”则认可这种做法。韦伯认为,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原则上应当有可能建构不同类型的经济理论” (斯威德伯格, 2021: 292), 这种观点使韦伯更趋近“原始派”的立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 马克思立场鲜明地拒绝了资本主义存在于古代社会的说法 (Love, 1986; 斯威德伯格, 2021: 363)。韦伯在《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学》(1897) 和《罗马的农业历史和其对公共法及私法的重要性》(1891) 中详细考察了古代近东和地中海地区的农业、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历史, 这为韦伯在一个广阔的框架内分析资本主义奠定了第一阶段的基础 (刘涛, 2021)。特别是, 韦伯详细考察了古代地中海地区曾经广泛存在的商业贸易和奴隶经济。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 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以赚取利润为目标的手工业及衍生的商业贸易, 是否也可以被认为是某种资本主义形式, 这是韦伯考察古代经济的重点之一。

就概念构建工作而言, 韦伯从不曾给“资本主义”下过一个正式的定义 (Durtzchi, 1966: 28), 但韦伯的“资本主义”类型学空前复杂, 并且, 被斯威德伯格 (2021: 81—82) 称为韦伯的经济社会学中最具有分析潜力的部分。韦伯的“资本主义”类型学的概念构建工作主要体现在《经济与社会》的第二章。这部分内容虽然位于整部作品的靠前位置, 但实际上是韦伯较晚完成的, 即晚于该作品后面的实证性材料章节 (Schluchter, 2021; Lepsius, 2012)。韦伯划分了理性资本主义、政治资本主义和传统商业资本主义这三种主要类型, 以及再细分的六种子类型 (斯威德伯格, 2021: 74)。根据特征的不同, 这些类型的资本主义可以存在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场合。比如, 所谓的古代资本主义是一种政治资本主义, 因为其运行形态完全受制于政治力量, 而这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完全不符。现代资本主义, 在韦伯这里, 即理性资本主义, 则是相当晚近的产物。这种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出现条件, 是韦伯的“资本主义”学说的核心命题, 也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的核心关切。

韦伯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思考出现在《经济通史》中。虽然《经济通史》是由韦伯学生的课堂笔记汇编而成的, 并且未经韦伯本人修订, 但 Collins

(1980)认为这部作品蕴藏着韦伯对资本主义和历史演化的成熟思考。不同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通史》列出了诸多形成现代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包括最终因素（如理性经济伦理、理性法律）、一般条件（如劳动力商品化、自由市场）和西方独特条件（如理性科学）^①（斯威德伯格，2021：32—33）。Schluchter（1985：1—12；1989：114—115）将韦伯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方法释读为“星群式方法”（*approach of constellation*）。^②就整体路径而言，韦伯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构建单向决定的因果关系。韦伯也拒绝了德国历史学派推崇的“经济阶段”概念，他更倾向于一种“类型”的概念（Roth，1987：75—91）。在韦伯眼里，有几种资本主义类型在彼此平行发展，相互之间并不存在前后相继的关系，也不存在必然的前进方向。

由此可见，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与松巴特不同。韦伯首先认为“资本”是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经济概念，是“在交换中寻求获利的商品”（Parsons，1929）。这一定义是韦伯划分多种资本主义类型的概念基础，但韦伯拒绝承认资本的这种性质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特征——因为它广泛存在于古代和不同的社会中。例如，松巴特认为犹太人在资本主义兴起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是韦伯认为围绕着犹太人形成的那种资本主义只是一种“贱民资本主义”（*pariah capitalism*），并不是现代资本主义（Momigliano，1980；Liebeschütz，1964）。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必须依赖于理性主义的扩展，这是使现代资本主义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如高利贷资本主义和政治投机资本主义等各种资本主义活动的最基本条件（吉登斯，2013：227）。

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的概念解释相当宽泛，他将资本主义等同于资本的逐利性经营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商业性网络，因此，对现代社会而言，资本主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祛魅”之后的现代理性资本主义——这一资本主义类型仅见于西欧地区。调查这一独特的理性化过程如何发生，就构成了韦伯后期工作的核心内容。韦伯认为，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构成了不同

① 彭小瑜（2022）认为韦伯在谈到西方具备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独特条件这一命题时，充满片面性和偏见，并且违背了韦伯自己的价值中立原则。

② 沃尔夫冈·施鲁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在与作者的多次交谈中，始终强调韦伯的星群式方法的重要性，认为这是避免将韦伯简单化为“文化决定论”者的一个关键。

发展路径的基础（李猛，2010），而这一思考逻辑，也构成了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框架（肖瑛，2020）。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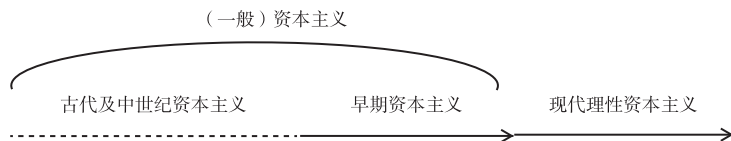


图2 韦伯的“资本主义”类型学^②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就“资本主义”的定义而言，松巴特与早期马克思有着更多共通之处；就资本主义的兴起因素而言，松巴特与韦伯有着更多共通之处。但不同于松巴特，马克思和韦伯一致认为，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出现的那些特许商人，不管他们所处何种行业，都不是现代资本家的前身。对马克思来说，真正的资本家是从与这些人的斗争中脱颖而出的；对韦伯来说，这些人代表了非理性资本主义的形式——政治资本主义。Kurz（2021）甚至将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描绘的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类同于马克思描绘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Schumpeter（1976：11）认为，韦伯的全部事实和论点完美地符合马克思的体系。从一个整体性角度论之，韦伯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理论，与马克思理论的相同之处则要远大于不同之处。这里也有必要引用一下蒙森（2023：125）的论断：

韦伯关于经济结构的宗教基础的论点，并没有直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他敏捷地认识到，资本主义一旦充分发展，即使没有任何特殊的经济职业伦理在“召唤”，资本主义也会照样存在，因为竞争作为经济过程的动力将使这种特殊职业伦理成为多余。就此而论，马克思主义图式在资本主义的成熟阶段倒是具有完全的效力。作为一个物质生产体系，

① 有必要提到，施鲁赫特教授亲口告诉笔者，《中国的宗教》一书的译名是错误的，韦伯德文作品的原名只是“儒家与道家”（*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中国的宗教”最初是英译者加上去的，但是韦伯并不认为儒家是一种宗教，韦伯认为儒家是中国的一种日常伦理。

② 这一图示主要基于欧洲的历史发展过程，实际上只刻画了韦伯描述的其中一条线索，目的在于与松巴特的类型学相比较。韦伯完整的“资本主义”类型学要复杂得多。

资本主义成了以往社会结构的巨大破坏者并瓦解了它们的特定文化理想。资本主义那种彻头彻尾的竞争原理，对人的作用力并非一种植根于宗教土壤的动力性经济心态，而是它本身俨然就是个宗教根源。它不仅将社会结构，同时也将文化理想本身理性化了。马克斯·韦伯精湛地描绘了资本主义的这些后果。

四、德国“资本主义”理论与“大分流”议题

德国学者很早便将目光聚焦在现代资本主义兴起这一关键性问题上。马克思十分精准地识别出资本主义兴起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分水岭式事件，它宣告了现代社会的到来。围绕着这一分析主题，以松巴特和韦伯为代表的德国学者产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后来分析“西方世界的兴起”提供了诸多分析性母题。尽管如此，在二战后的英美现代经济学领域，德国思想界的“资本主义”相关理论却被忽视了。在此领域贡献最多的新制度经济学也鲜有提及德国前辈的开创性思想（Peukert, 2001b），尽管美国的老历史学派曾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后裔。

传统的欧洲中心论学者将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的过程规范化，将之确立为一条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由此而得到的学术结果，便是对照这一“西欧路径”，寻找其他文明所缺少的元素。例如，西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天主教会、独立城市、松散的政治体制等，便成了资本主义出现的必要条件。而这些因素，甚少出现于世界其他地区。欧洲中心论的极端立场，可见于孟德斯鸠（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Montesquieu）和黑格尔，他们将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描述为“停滞的”（Anderson, 1979: 462—550）。这种分析视角充满了漏洞，已为学界所抛弃。

近三十年来，一批在美国加州工作的历史学家将传统欧洲中心论彻底翻转，认为在1800年以前，欧洲并没有领先世界其他地区的制度性优势，而是一些偶然性事件推动了欧洲的领先地位。该学派也被称为加州学派。Pomeranz（2000）认为是新大陆的发现和英格兰煤矿的区位优势——这种偶然因素——使英国经济得以突破资源束缚，领先世界其他地区。Goldstone（2002）也认为直到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才具备了超越世界其他地区的条件。更进一步，Rosenthal and

Wong (2011) 将近代以前的中国传统治理模式描绘为“善政”，从制度层面否认传统中国发展工商业经济的劣势特征。加州学派在重新认知经济史研究中的中西比较问题和经济增长根本动力方面，提出了相当多的突破性论点。

本文所论述的三位德国学者所持的立场与加州学派截然相反。谢弗德 (2023) 呼吁将德国“资本主义”学说引入对“大分流”议题的讨论。尽管有着诸多分歧，但是，马克思、松巴特、韦伯在一点上是一致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有着深远的、长期的根源，这一过程是数百年乃至千年来漫长发展的一个结果，绝非偶然性、突发性的短期事件所能造成的。这种立场在过去被归结为欧洲中心主义。但是，正如本文力求做到的，如果更细腻地考察他们的“资本主义”分析，就会发现三人的立场绝非欧洲中心主义这般简单。譬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站在传统人身依附关系的解体基础上，松巴特提出资本主义是一个经济系统的完全转变，韦伯提出对现代资本主义兴起进行“星群式”分析，这些学说都依然具有现实的思想价值。

德国思想界对“资本主义”的兴起提出的丰富解释，涉及技术改进、组织结构变化、经济心态变化、企业家作用等方面。二战后的现代经济学将欧洲的领先归结于产权保护、资本积累、技术革新等，发展经济学针对落后国家的经济起步开出了劳动力转移、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和基于比较优势的自由贸易等多种“药方”。在某种程度上，其中大部分观点是对德国老一代“资本主义”思想家相关理论的延伸与深化。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既是欧洲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过程，也是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和经济起飞过程，更是社会的整体现代化过程。马克思、松巴特和韦伯对这一兴起过程，提供了宏大而且细腻的考察框架，如果将其引入当下的经济史、政治经济学研究并形成对话，不仅可以为“大分流”议题提供新的思想动源，而且可以为新制度学派和发展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洞见。试举一例说明之，韦伯认为，社会伦理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在现代经济学中，家庭伦理和社会行为模式的转变已成为发展经济学构建模型时的一个关键变量 (姜宏, 2022; Galor and Weil, 1996)。

五、总结与启示

Parsons (1928) 在分析松巴特和韦伯作品性质的时候总结道：自从伊曼纽

尔·康德 (Immanuel Kant) 之后, 德国思想界就存在一种“钟摆式运动”, 思想倾向在强调“精神”和强调“物质”之间来回摆动。黑格尔是强调“精神”的一个极端, 其后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Ludwig Feuerbach) 和青年黑格尔派是强调“物质”的另一个极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后者的一个部分, 松巴特和韦伯又代表了摆锤摆回黑格尔一端的一次运动。尽管从思想倾向上而言, 这种评论并无大谬; 但是, 还是要强调, 无论是马克思对黑格尔, 还是松巴特、韦伯对马克思, 都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次“倒转” (吉登斯, 2013: 266)。

以“资本主义”的概念构建和现代资本主义兴起原因为中心, 本文考察了马克思、松巴特、韦伯这三位德国思想家的“资本主义”学说。从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脉络的思想继承关系 (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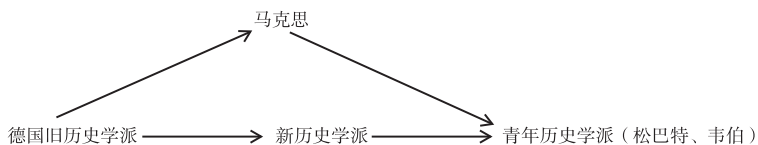


图3 马克思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关联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马克思开启了对资本主义兴起的讨论, 而且相比任何一位学者, 马克思都采取了远为宏阔的视野。他不仅从历史中提取分析材料并形成了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关怀, 而且将对资本主义未来命运的关切置于分析框架的中心——走向衰败的资本主义将在一次次危机中迎来向社会主义光明未来的转变。马克思一再强调, 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剖析从来都是“科学性的”, 而绝非“道德性的”, 《资本论》中并不包含价值判断。历史学派的伦理命题在马克思的学说体系中一再弱化, 也正是这种立场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现实力量。松巴特和韦伯则从历史学派中汲取灵感, 在对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反叛”中发展自己的理论。其结果, 便是形成了三个体系庞大的“资本主义”理论。

从更广阔的视角而论, 德国的“资本主义”理论具有巨大的学术潜力。在此举出两例。其一,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认知, 涉及一般经济理论的构建, 这既关涉时间维度上的古今经济性质研究 (Schefold, 2011b: 131—163), 也关涉空间维度上的多种资本主义社会 (Hall and Soskice, 2001; Lane and Myant, 2007; Coates, 2005)。其二, 德国历史学派对人的行为的伦理学

关切、韦伯对于人的多种理性类型的划分，对完善经济理论的前提假设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谢弗德，2023）。

对于中国而言，理解“资本主义”相关理论、挖掘其中的思想，也将为中国借鉴外国思想资源、打造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宝贵的价值。西方现代社会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发展实际上步调一致，因此，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所蕴含的多种独特因素出现的过程。将资本主义还原为一种经济系统——虽然独特，但也只是一种经济系统——将有利于区分何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何为资本主义欧洲版本的独有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无疑将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进步提供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双重借鉴。正如 Plumpe（2019：15—16）所言：

进步与落后乃是经济转变的两种固有规律；然而，由于在不同时间内，各地的发展处在变化之中，所以这些特征绝不会永远属于某些特定地区，而是会不断重新分配。……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视角将被世界经济视角所取代，须知，世界经济的出现本身便是欧洲扩张动力的产物和后果，最终又将欧洲扩张的动力甩在了身后。

参考文献：

- 本迪克斯，莱因哈特，2020，《马克思·韦伯思想肖像》，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 胡明，2008，《历史学派与德国特殊发展道路》，《德国研究》第3期。
- 胡明，2019，《政治经济学史论》，经济管理出版社。
- 吉登斯，安东尼，2013，《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 贾根良、黄阳华，2007，《施穆勒纲领与演化经济学的起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姜宏，2022，《西方世界兴起的微观机制——读范赞登等〈资本女性〉》，《经济社会史评论》第3期。
- 柯林斯，兰德尔、迈克尔·马科夫斯基，2014，《发现社会：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李霞译，商务印书馆。
- 黎岗，2022，《施莫勒著作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综述》，《经济思想史学刊》第3期。
- 李猛，2010，《理性化及其传统：对韦伯的中国观察》，《社会学研究》第5期。
- 李哲罕，2014，《“德国历史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对弗里德里希·梅尼克思想的考

- 察》，《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刘林平、任美娜、杨阿诺，2021，《“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命题之反思》，《社会科学》第2期。
- 刘涛，2021，《农业、国家与文明——韦伯农业社会学的问题视野及其当代价值》，《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吕守军，2010，《当代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演化经济学分析》，《教学与研究》第12期。
-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卡，1998，《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卡·弗·恩格斯，2012，《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 马涛，2020，《儒家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
- 梅俊杰，2017，《重商主义真相探解》，《社会科学》第7期。
- 梅俊杰，2022a，《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学说的重商主义渊源》，《经济思想史学刊》第3期。
- 梅俊杰，2022b，《李斯特与赶超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
- 蒙森，沃尔夫冈·J.，2023，《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阎克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 彭小瑜，2022，《资本主义批评与实证的历史研究——重读韦伯的古代社会论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 桑巴特，维尔纳，2023，《施穆勒纲领的体系化尝试——桑巴特的“经济系统”》，载古斯塔夫·冯·施穆勒等《施穆勒纲领、经济系统与经济模式：德国新历史学派经济学选读》，黎岗、刘夏霖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 沈越，2013，《论古典经济学的市民性质——马克思市民理论再探讨》，《经济研究》第5期。
- 斯通普夫，撒穆尔·伊诺克、詹姆斯·菲泽，2009，《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邓晓芒、匡宏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斯威德伯格，理查德，2021，《马克斯·韦伯与经济社会学思想》，何蓉译，商务印书馆。
- 唐万宁，2022，《再论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内涵：从历史标签到原始文献》，《经济思想史学刊》第2期。
- 童欣，2011，《桑巴特笔下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8期。
- 伍德，埃伦·米克辛斯，2016，《资本主义的起源：学术史视域下的长篇综述》，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希尔德布兰德，布鲁诺，2023，《艾森那赫社会问题研讨大会与施穆勒的开幕讲话》，载古斯塔夫·冯·施穆勒等《施穆勒纲领、经济系统与经济模式：德国新历史学派经济学选读》，黎岗、刘夏霖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 肖瑛, 2020, 《家与韦伯的比较历史社会学——以〈中国的宗教〉为例》, 《社会学评论》第3期。
- 谢弗德, 波特伦, 2023, 《马克思、桑巴特、韦伯与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争论》, 姜宏、曹君豪译, 《经济社会史评论》第4期。
- 熊春文, 2022, 《韦伯的农业社会学研究及其意义——以〈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学〉为例》, 《社会理论学报》第1期。
- 严鹏, 2011, 《德国历史学派与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德国研究》第2期。
- 严鹏, 2015, 《韦伯与经济史的理论问题——以〈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学〉为中心》, 《近代史学刊》第1期。
- 晏小宝, 2023, 《战争与资本主义·序言》, 载维尔纳·桑巴特《战争与资本主义》, 晏小宝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 Anderson, Perry. 1979.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Verso.
- Appel, Michael. 1992. *Werner Sombart: Historiker und Theoretiker des Modernen Kapitalismus*. Marburg: Metropolis.
- Backhaus, Jürgen (ed.). 1996. *Werner Sombart; Social Scientist*. Marburg: Metropolis.
- Birnbaum, Norman. 1953. “Conflicti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Rise of Capitalism: Marx and Weber.”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 (2): 125 – 141.
- Blaug, Mark.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and, Arie. 1982. “Against Romanticism: Max Weber and the Historical School of Law.” *Australian Journal of Law & Society* 1 (1): 87 – 100.
- Coates, David (ed.). 2005.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Varieties of Approach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Collins, Randall. 1980. “Weber’s Last Theory of Capitalism: A Systematiz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 (6): 925 – 942.
- Croce, Benedetto. 1914.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Karl Marx*, translated by Christabel M. Meredith.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 Curi, Luiz F. B., and Ian C. d. S. Almeida. 2022. “Beyond the *Sonderweg*: Defining Political Economy in 19th – Century Germany.”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9 (2): 197 – 217.
- de Paula, Patrick Galba. 2015. “Main Interpretations of Marx’s Notion of Development: A Critical Review.” *Science & Society* 79 (4): 582 – 609.
- Durtschi, Georges. 1966. *Der Begriff des 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 Turbenthal: Buchdruckerei Turbenthal.
- Epstein, Moshe M. (trans.). 1913. “Preface.” In *The Jews and Modern Capitalism*, written by

Werner Sombart. London: Uwin.

Erhard, Ludwig. 1957. *Wohlstand für Alle*. Düsseldorf: Econ Verlag.

Galor, Oded, and David N. Weil. 1996. "The Gender Gap, Fertility,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 (3): 374–387.

Giddens, Anthony. 1970. "Marx, Web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Sociology* 4 (3): 289–310.

Goldstone, Jack A. 2002. "Efflorescenc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World History: Rethinking the 'Rise of the West'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3 (2): 323–389.

Grundmann, Reiner, and Nico Stehr. 2001. "Why is Werner Sombart Not Part of the Core of Classical Sociological?"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1 (2): 257–287.

Hall, Peter A., and David Soskice (eds.). 2001.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nnis, Wilhelm. 1988. "Eine »Wissenschaft vom Menschen«. Max Weber und die deutsche Nationalökonomie der Historischen Schule." In *Max Weber und seine Zeitgenossen*, edited by Wolfgang Mommsen, pp. 41–83. Göttingen: Vandenhöck & Ruprecht.

Hilton, R. H. 1952. "Capitalism-What's in a Name?" *Past & Present* 1 (1): 32–43.

Hintze, Otto. 1931. "Kalvinismus und Staatsräson in Brandenburg zu Beginn des 17. Jahrhunderts."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44 (2): 229–286.

Hollander, Samuel. 2011. *Friedrich Engels and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selitz, Bert F. 1960. "Theories of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ories of Economic Growth*, edited by Bert F. Hoselitz, pp. 193–238.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Janssen, Hauke. 2011. *Nationalökonomi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slehre in den dreißiger Jahren des 20. Jahrhunderts*. Marburg: Metropolis.

Jiang, George H. 2023. *The Imperial Mode of China: An Analytical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Kalberg, Stephen. 1992. "The German *Sonderweg* De – Mystified: A Sociological Biography of a Natio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9: 111–124.

Katz, Claudio J. 1993. "Karl Marx on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Theory and Society* 22 (3): 363–389.

Kersting, Felix. 2022. "Welfare Reform and Repression in an Autocracy: Bismarck and the Socialists." European Historical Economics Society (EHES) Working Papers 0227.

Kocka, Jürgen. 1973. "Karl Marx and Max Weber im Vergleich: Sozialwissenschaften zwischen Dogmatismus und Dezisionismus." In *Geschichte und Ökonomie*, edited by Hans-Ulrich Wehler,

pp. 54 – 84. Köln: Kiepenheuer & Witsch.

- Kořakowski, Leszek. 2005.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The Founders, the Golden Age and the Breakdown*, translated by p. S. Fall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Kruse, Volker. 1990. “Von der Histor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zur Historischen Soziologie.”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19 (3): 149 – 165.
- Kumar, Ashutosh. 1992. “Marx and Engels on India.” *The In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3 (4): 493 – 504.
- Kurz, Heinz D. 2021. “Max Weber on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Investigación Económica* 80 (318): 32 – 71.
- Lane, David, and Martin Myant (eds.). 2007.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Lehmann, Hartmut. 1993. “The Rise of Capitalism: Weber versus Sombart.” In *Weber’s Protestant Ethic: Origins, Evidence, Contexts*, edited by Hartmut Lehmann, and Guenther Roth, pp. 195 – 20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nger, Friedrich. 2012. *Werner Sombart 1863 – 1941: Eine Biographie*. München: C. H. Beck.
- Lepsius, M. Rainer. 2012.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The Legacy of Max Weber in the Light of the Max Weber-Gesamtausgabe.” *Max Weber Studies* 12 (1): 13 – 23.
- Levine, Norman. 1987.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of Law and the Origin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8 (3): 431 – 451.
- Liebeschütz, Hans. 1964. “Max Weber’s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Judaism.” *The Leo Bäck Institute of Year Book* 9 (1): 41 – 68.
- Love, John R. 1986. “Max Weber and the Theory of Ancient Capitalism.” *History and Theory* 25 (2): 152 – 172.
- Momigliano, Arnaldo. 1980. “A Note on Max Weber’s Definition of Judaism as a Pariah-Religion.” *History and Theory* 19 (3): 313 – 318.
- Mommsen, Wolfgang. 1977. “Max Weber as a Critic of Marxism.”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 (4): 373 – 398.
- Musto, Marcello. 2008.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of the Grundrisse in the World: Introduction.” In *Karl Marx’s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50 Years Later*, edited by Marcello Musto, pp. 177 – 188. London: Routledge.
- Nipperdey, Thomas. 1993. “Max Weber, Protestantism, and the Debate around 1900.” In *Weber’s Protestant Ethic: Origins, Evidence, Contexts*, edited by Hartmut Lehmann, and Guenther Roth, pp. 73 – 8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rsons, Talcott. 1928. “‘Capitalism’ in Recent German Literature: Sombart and Webe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6 (6): 641 – 661.

- Parsons, Talcott. 1929. “ ‘ Capitalism ’ in Recent German Literature; Sombart and Weber (Concluded).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7 (1): 31 – 51.
- Peukert, Helge. 2001a. “The Schmoller Renaissanc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3 (1): 71 – 116.
- Peukert, Helge. 2001b. “ Bridging Old and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Gustav Schmoller and Douglass C. North, Seen with Oldinstitutionalists’ Eyes. ” *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1 (2): 91 – 130.
- Pirenne, Henri. 1914. “The Stag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Capitalism. ”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 (3): 494 – 515.
- Plumpe, Werner. 2019. *Das kalte Herz; Kapitalismus; Die Geschichte einer andauernden Revolution*. Berlin; Rowohlt Berlin Verlag.
- Pomeranz, Kenneth. 2000.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radella, Lucia. 2014. “New Development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 *Competition and Change* 18 (2): 180 – 193.
- Riesebrodt, Martin. 1986. “From Patriarchalism to Capitalism; The Theoretical Context of Max Weber’s Agrarian Studies. ” *Economy and Society* 15 (4): 476 – 502.
- Rosenthal, Jean-Laurent, and R. Bin Wong. 2011. *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and Europ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oth, Günther. 1968. “Das Historische Verhältnis der Weberschen Soziologie zum Marxismus. ”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20: 429 – 447.
- Roth, Günther. 1987. “Rationalization in Max Weber’s Developmental History. ” In *Max Weber, Rationality and Modernity*, edited by Sam Whimster, and Scott Lash, pp. 75 – 91. London; Allen & Unwin.
- Salomon, Albert. 1945. “German Sociology. ” In *Twentieth Century Sociology*, edited by Georges Gurvitch, and Wilbert E. Moore, pp. 586 – 614. New York: Basic Books.
- Schefold, Bertram. 1989. *Mr. Sraffa on Joint Production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Unwin Hyman.
- Schefold, Bertram. 1992. “Max Webers Werk als Hinterfragung der Ökonomie. ” In *Zur Entstehungs- und Wirkungsgeschichte von Max Webers -Protestantischer Ethik*”, edited by Bertram Schefold, and Günther Roth, pp. 5 – 31. Düsseldorf: Verlag Wirtschaft und Finanzen.
- Schefold, Bertram. 1996.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and the Belief in Ethical Progress. ” In *Ethical Universal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dited by F. Neil Brady, pp. 173 – 196 . Heidelberg: Springer.
- Schefold, Bertram. 2011a. “The Applicability of Modern Economics to Forms of Capitalism in

Antiquity: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Textual Evidence.”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Asymmetries* 8 (1): 131 – 163.

Schefold, Bertram. 2011b. “A Contribution to Weber’s Theory of Modern Capitalism: Amortization according to Sraffa as a Rational Substitution of Missing Markets.” In *Keynes, Sraffa and the Criticism of Neoclassical Theory*, edited by Neri Salvadori, and Christian Gehrke, pp. 179 – 200. London: Routledge.

Schefold, Bertram. 2016. “Antiquity.” In *Handbook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Volume II*, edited by Gilbert Faccarello, and Heinz Kurz, pp. 5 – 19.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House.

Schefold, Bertram. 2019. “A Western Perspective on the *Yantie Lun*.”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Han Dynasty and Its Legacy*, edited by Lin Cheng, Terry Peach, and Fang Wang, pp. 153 – 174. London: Routledge.

Schluchter, Wolfgang. 1985. *The Rise of Western Rationalism: Max Weber’s Developmental History*, translated by Guenther Ro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chluchter, Wolfgang. 1989. *Rationalism, Religion, and Domination: A Weberian Perspective*, translated by Neil Solom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chluchter, Wolfgang. 2021. “Die Max Weber-Gesamtausgabe. Voreditionen-Konzeption der Ausgabe-Wichtige Ergebnisse.” *Berliner Journal für Soziologie* 31: 9 – 22.

Schmoller, Gustav von. 1920. *Grundriß der Allgemeinen Volkswirtschaftslehre, Erster Teil*. München /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Schumpeter, Joseph. 1976. *Capitalism, Socialism & Democracy*. New York: George Allen & Unwin.

Shigeta, Sumio. 2004. “Zur Herkunft und Verbreitung des Begriffs ‘Kapitalismus’ .”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87 – 94.

Sombart, Werner. 1894. “Zur Kritik des ökonomischen Systems von Karl Marx.” *Archiv für Soziale Gesetzgebung und Statistik* 7: 555 – 594.

Stammler, Rudolf. 1914. *Wirtschaft und Recht nach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es Auffassung: Eine Sozial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 Leipzig: Veit.

Swedberg, Richard. 1995. “Schumpeter’s Vision of Socioeconomics.”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24 (4): 525 – 544.

Sweezy, Paul, and Maurice Dobb. 1950.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Science & Society* 14 (2): 134 – 167.

Topolski, Jerzy. 1990. “Max Weber’s and Karl Marx’s Approach to Historical Explanation.” *Cultural Dynamics* 3 (2): 154 – 172.

Tribe, Keith. 1995. *Strategies of Economic Order: German Economic Discourse, 1750 – 19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ber, Max. 1993. “Der Nationalstaat und die Volkswirtschaftspolitik.” In *Max Weber-Gesamtausgabe, Band I/4, 2: Landarbeiterfrage, Nationalstaat und Volkswirtschaftspolitik*, edited by Wolfgang Mommsen, and Rita Aldenhoff. Tübingen: Mohr Siebeck GmbH.

Understanding “Capitalism” : A Theoretical Comparison Between Marx, Sombart and Weber

Jiang Hong

(Max Weber Institute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Abstract: The genesis of modern capitalism is one of the most intriguing topics in social sciences. “Capitalism” as an intellectual concept mainly stems from Marx’s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Marx’s relevant analysis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which has long been ignored by scholars. Marx’s perspective on “capitalism” underwent a shift before and after the creation of *Das Kapital*, resulting in two different usages. After Marx, two representatives of the Younger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Sombart and Weber, built upon the orthodox stance of the Historical School, analyzed the genesis of capitalism from the opposite direction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constructed more complex theories of “Capitalism”. These German theories of “Capitalism” touched on the theme of the genesis of the West earlier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more profoundly than modern economics. Study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theories of “Capitalism” is not only theoretically important for deepening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economic history, but also has crucial practical value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modern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Keywords: Capitalism, Karl Marx, Werner Sombart, Max Weber,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JEL Classification: B14, B15, B31

(责任编辑: 王姣娜)